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ISM WITH

读懂 “中国特色”

“老路”与“新路”、“邪路”与“正路”

姜中才 / 著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读 懂
“中国特色”

“老路”与“新路”、“邪路”与“正路”

姜中才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懂“中国特色”：“老路”与“新路”、“邪路”与“正路”/
姜中才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 - 7 - 5097 - 6799 - 3

I. ①读… II. ①姜…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
建设模式 - 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7314 号

读懂“中国特色”

——“老路”与“新路”、“邪路”与“正路”

著 者 / 姜中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295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799 - 3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 言	1
第一章 “大结构观”——三位一体的“新路”与“正路”	5
第一节 道路——矢志中国梦的实践之路	5
第二节 理论——经验的逻辑升华、实践的行动指南	23
第三节 制度——成功经验法规化准则、道路实践的 根本性保障	27
第二章 “大科学观”——“新路”或“正路”之基	100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旨归与缘起	100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语境中的社会主义	105
第三节 新经济政策——列宁语境中的社会主义	123
第四节 独特气质的四大特色——“中国特色”的 科学真谛	136
第三章 “大警示观”之“老路”——苏联模式的本真教训	144
第一节 苏联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144
第二节 苏联模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146
第三节 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端及恶果	152

第四节 苏联模式的本真教训——“死路一条”的 封闭僵化	154
第四章 “大警示观”之“邪路”——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的本真启示	156
第一节 苏联解体	156
第二节 东欧剧变	159
第三节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恶果	162
第四节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	164
第五节 本真启示——警惕民主社会主义的“邪路”	168
第五章 “大历史观”——“中国特色”的历史逻辑	183
第一节 “落日的辉煌”与“奇异的悲歌”	184
第二节 百年的耻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86
第三节 奋起抗争——不同阶级轮番上阵	190
第四节 艰苦卓绝的“第一次结合”	207
第五节 “以苏为鉴”的“第二次结合”	213
第六节 科学认识探索失误——以农业合作化为主线	219
第六章 “大特色观”——毛泽东遗留的中国特色	228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之特色	229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之特色	240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或发展道路之特色	242
第七章 “大发展观”——“中国特色”的巨大成就	254
第一节 “四个现代化”——前30年的辉煌成就	255
第二节 中国式现代化——小康水平的现代化	269

第三节 重要战略机遇期——黄金发展期与风险高发期	275
第四节 “中国梦”——凝聚正能量的集结号	283
 第八章 “大时代观”——“中国特色”的世界意义	290
第一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软竞争的时代	291
第二节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与“普世价值论”的式微	296
第三节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300
第四节 “中国特色”与时代大势	302
 结 语	311
 参考文献	315
 后 记	322

引言

2012年，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了一个令国人和世人纷纷揣摩的道路性命题：“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

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②？十八大之后，以往的各类揣摩似乎变得明朗起来，因为党的十八大用“道路、理论和制度”给“中国特色”这面旗帜赋予了三位一体的内涵界定，并号召全党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就是说，“中国特色”这面伟大旗帜，不再是令人费解的“雾里看花”之旗，而是有了坚实支撑的航标之旗——支撑于三位一体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其逻辑关系是：旗帜，引领中国梦亦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或目标；道路，实现旗帜目标的基本途径；理论，实现旗帜目标的行动指南；制度，实现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第12页。

② 为简约起见，本书中所说的“中国特色”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旗帜目标的根本保障。至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各自内涵，尽管十八大只是提纲挈领地略加表述，但毕竟给出了框架性界定，使得“中国特色”至少在线条上显得更加清晰起来。

不过，线条上的清晰只是“略知其然”，欲读懂“中国特色”，更关键的则在于“知其所以然”。尤其是对“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人们虽然见仁见智，似乎也都略知一二，但因为十八大只是提出命题，而未给予明确说明，故在更深的层面还是需要认真加以分析的：

——“老路”指什么？“封闭僵化”指什么？谁想走“老路”？“老路”能否复制？“老路”的要害是什么？“毛泽东热”是否意味着“老路”的回归？

——“邪路”指什么？“改旗易帜”指向什么？谁想走“邪路”？“邪路”是否有市场？“邪路”的危害在哪里？改革开放是否意味着走向“邪路”？

——“中国特色”既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那么“新路”何在？“正路”在何？

这些“所以然”的问题不解释清楚，“中国特色”就失去了“新路”或“正路”所在的参照坐标；人们对“中国特色”的认识就会模糊不清；“三个自信”的程度就会大打折扣；埋怨牢骚就会充斥坊间，杂音噪声就会有隙可乘，社会稳定尤其是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也就难以积聚。

增强全党乃至全社会的“三个自信”，既是将十八大精神落到实处的关键，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故此，2013年初，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要树立改革创新意识，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方法手段创新，不断推动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时俱进、健康发展。”^①

提升“三个自信”的程度，在实践层面取决于化解社会问题、应对国际挑战的正能量，在理论层面上取决于怎样读懂“中国特色”。在实践层面仍处于“现在进行时”甚或“将来进行时”的形势下，提升的关键则在于读懂“中国特色”的理论层面。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古诗告诉我们：不谋总体是井底之蛙；不谋大势是夜郎自大；不谋总体和大势，则不足以谋“三个自信”。相对于普通党员干部和民众而言，“读懂”的关键固然离不开对“三个自信”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理解读，更在于将这种学理解读融汇于他们普遍关注却又理不清楚的总体性或大势性的多维视域之中。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研究方法，基于学界的启发性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顺应国内外相关研究趋势，尤其是用“中国道理”解读“中国道路”的研究趋势，以怎样读懂“中国特色”为主线，以增强全党全社会“三个自信”为旨归，以“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基本视域，恪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将“中国特色”融合到“大结构观”“大科学观”“大警示观”“大历史观”“大特色观”“大发展观”“大世界观”“大时代观”的多维视域中，予以既共时又历时的总体性认识和把握，探求既符合逻辑又简单易懂的增强“三个自信”的逻辑路径，对丰富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引导人们真正理解“中国特色”，进一步增强“三个自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所谓“大结构观”，即“中国特色”之“新路”或“正路”的逻辑结构及基本内涵，亦即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各自结构、相互结构及基本内涵。

所谓“大科学观”，即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真谛，“中国特

^① 《刘云山：引导全党增制度自信 为实现中国梦奋斗》，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04/c1024-2008764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9月6日。

色”的“科学”所在。

所谓“大警示观”，即封闭僵化之“老路”与改旗易帜之“邪路”之于“中国特色”的本真教训或本真启示。

所谓“大历史观”，即生成“中国特色”的历史逻辑。

所谓“大特色观”，即“中国特色”所体现的革命特色和建设特色。

所谓“大发展观”，即中国打造“世界奇迹”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所谓“大世界观”或“大时代观”，即“中国特色”的世界意义或时代价值。

基于上述多维视域，本书采用学界、媒体相关研究成果和权威资料，力求严谨、平实、符合逻辑，以期读者能够既感性又理性地读懂“中国特色”，坚定“三个自信”。

第一章

“大结构观”——三位一体的 “新路”与“正路”

当今世界普遍关注且纷纷热议的“中国道路”，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突破封闭僵化之“老路”的“新路”，拒绝改旗易帜之“邪路”的“正路”。胡锦涛2011年的“七一”讲话，将其具化为三位一体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并将建党90年来的基本成就概括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①。据此，党的十八大既提纲挈领地阐释了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结构逻辑及基本内涵，又号召“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②

第一节 道路——矢志中国梦的实践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致力于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之路。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第7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第16页。

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制度生成，都基于这一实践之路。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笔者着力从“所以然”的角度解读这一实践之路的七个主要层面。

一 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的实践之路，之所以能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关键之一就是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如此，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才首次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中央全会的名义肯定了这一论断^②。

在对“中国特色”说三道四的杂音噪声中，一般都将其贬低污蔑为“一党专制”。

客观公正地来看，这种贬低污蔑的做法犯了两个常识性错误。

其一，“一党专制”是指一个政党独霸政权，不允许其他政党参政议政，甚至不允许其他任何政党存在。而在中国，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八大民主党派及各级政治协商会议都客观存在；都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性框架内机制性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的咨询或协商；都在以各种渠道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行为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监督；都有代表出任各级政府机构的各类领导职务。尽管这个政党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或完善，使其形式与内容更加有机统一，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都需要进一步改革或完善。众所周知，美国的政党政治就被金融、军火和石油三大财团操控。因此，“一党专制”这种贬低污蔑性表述，既不符合其内含界定，也不符合中国政党政治的实际状况。

^①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25/c_122197737_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30日。

其二，在当今世界，即使是比较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其实也都是“一党专制”，只不过形式上是多党或两党轮流坐庄而已。贬低污蔑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缺乏一个起码的常识：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管其生成背景或存在形式有多么复杂，在本质上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而由其中坚分子组成的领导性或核心性政治组织。为了阶级利益最大化，各类政党都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最具威权力的国家政权；而最终取得政权的，只能是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但是，这个阶级不可能全员出动，都去政权机构任职，只能责成本政党及其骨干精英走到前台来进行统治。而在现实社会中，任何阶级都不可能“铁板一块”，其内部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利益阶层；每个阶层，或若干利益相近的阶层，为维护本阶层的利益，又都会推出一个政党，导致阶级内部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以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为例，就其渊源来看，前者代表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后者代表南方农业资产阶级。它们虽然都打着“全民党”的旗号，但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所以才能在事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大政方针上团结一致（尽管有时候也会为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斗来斗去，甚至斗到让政府几度“停摆”的程度）。这就是说，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其实都是就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内部而言的，根本不存在两个对立阶级之间“轮流坐庄”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有时候允许一些“工人政党”执政，搞一些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的改良，但这个“工人政党”必须是带引号的，亦即多半资本化的，而且绝对不许动摇资本私有制这一资产阶级的统治根基。在任何情况下，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不会允许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共产党执政。因此，总体上看，当今世界上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其实都是一个统治阶级的“一党专制”，只不过是一党之内的两个或多个派别而已。

那么，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效仿资产阶级也实行多党制或两党制呢？其实，在西方早期的工人运动中，一国之内多党或两党并存的现象很多。以德国为例，1863年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

年又成立社会民主工人党，只是到了1875年，两党才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1891年更名为沿用至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什么要合并呢？其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统治力量太强大，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若不抱成团，就很难斗得过它。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在五四运动时期的1919年，在全国约4.5亿人口中，各类工人只有200万人左右。即使到了1949年，在中国大陆约5.4亿人口中，各类工人也只有800万人左右。如此薄弱的阶级力量，再分成七零八落的若干政党，要想战胜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反动统治者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建设一个纪律严明、团结统一的政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反对在工人阶级内部同时存在多个政党，但他们特别强调：“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而“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就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可以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也就是说，共产党不能混同于一般的工人政党，必须凭着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亦即代表全体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先进性，赢得在工人运动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基本事实：哪个人不自私，处处为大家着想，遇着难事总能拿出好点子，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人们就乐意靠近他，甚至追随他。一个人如此，一个组织也是这样。虽然工人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利益分层，但相比而言，其整体利益要比唯利是图而钩心斗角甚至互相倾轧的资产阶级一致得多。所以，一旦共产党具备了代表全体工人阶级利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处处为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着想，久而久之，就会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众望所归，就会使那些只代表个别阶层或局部利益的工人政党失去市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就是这样形成的。关键一条，它确实代表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4页。

中国工人阶级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至此，我们还有必要分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领导核心的历史逻辑。

在贬低污蔑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杂音噪声中，更有荒唐者，居然将中国共产党打入“非法组织”之列。其荒谬的根据是：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并没有注册。

什么是“法”？就其实质而言，“法”就是在经济上占据国家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用政权强制力将其阶级意志规范化的总称。1921年的中国政权，是清朝遗老遗少组成的北洋军阀政权。让这样一个反动政权给想要推翻的它的中国共产党注册，真是荒谬之极。

那么，是谁给中国共产党“注册”并使其合法化的呢？历史地看，是中国亿万百姓。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也就50多个党员，而且处在极度“地下”状态，在当时的诸多政党中，可谓名不见经传；与当时根基稳固且后来又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且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相比，更是弱小得太多。

为什么这样一个处于极度“地下”状态的小党后来却能够将拥有几百万美式装备之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不得不溃退台湾呢？这正应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老话，亦即“得民心者得大法”。

比如，共军采取“化整为零”的游击战，相对于拥有美式装备的国军而言，其力量要小得多。可就是这个“到敌人的后方去”的游击战，在抗战时期，将日本华北派遣军、部分华中派遣军及汪伪军队的绝大部分牵制在敌后战场，为国军在正面战场的节节撤退、坚守大西南赢得了宝贵的空间和时间，进而为最后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宣布投降时，美国之所以帮助国军匆忙空运部队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抢占受降地盘，就是因为大多数敌占区都让进行游击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给占据了。为什么国军就不能进行游击战呢？关键在于两点：其一，游击战的战士必须自愿入伍，而不是强行拉来的“壮丁”——只有自愿参战的战士，才能满足游击战“散而能聚”或“分

而能合”的基本要求。从总体来看，这是由“壮丁”组成的国军所不敢做的——大多是强行拉来的“壮丁”，本身就想跑，一旦化整为零打游击，非跑个一干二净不可。其二，必须有“军民鱼水情”的关系。这是因为，游击战基本上是没有专业性后勤体系的作战，需要在广大农村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每到一处，都可以从老百姓那里得到后勤补给，不仅吃穿住用，还包括照顾伤员，作向导，提供情报，甚至直接组织民兵加入作战等。尽管国军在共军的帮助下举办过抗日性的“游击干部训练班”，部分溃散部队或特遣分队也在敌后打过游击战（包括刘震东、范廷兰等“游击司令”以身殉国），但从整体来说，这是“刮民党”或过度依赖城市的国军很难做得到的。

再如，解放战争中直逼蒋家王朝之心脏的淮海战役，歼敌 55 万人，是三大战役中歼敌数量最多的战役。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那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大军。战争高潮时，不算 20 万参战民兵，支前民工与 60 万解放军参战兵力的比例高达 9:1，达 543 万之众。

“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老百姓们就是唱着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歌谣，推着小推车汇入支前大军的（见图 1-1）。陈毅元帅曾深情地感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乡亲父老用小推车推出的！”^① 有部电影叫《车轮滚滚》，就是这些可歌可泣之“小推车”的情景再现。

还有一个国军将领的亲历故事，很能说明国共两党的人心向背。1948 年 3 月，解放军攻打洛阳，擒获国民党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少将。在押解途中，当他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不穿军装的军队”在为解放军运送粮草弹药、修筑桥梁公路时，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惊呼：“国民党将领总喜欢一口一个‘八百万’，殊不知共产党的军队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有一天，他住进一间破烂的房子里，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头弄来半块烧鸡，并且带了二两土酒给他。这使他又冒出一种

^① 江深、陈道阔：《大决战（下）：彼岸》，（香港）中原出版社，1991，第 20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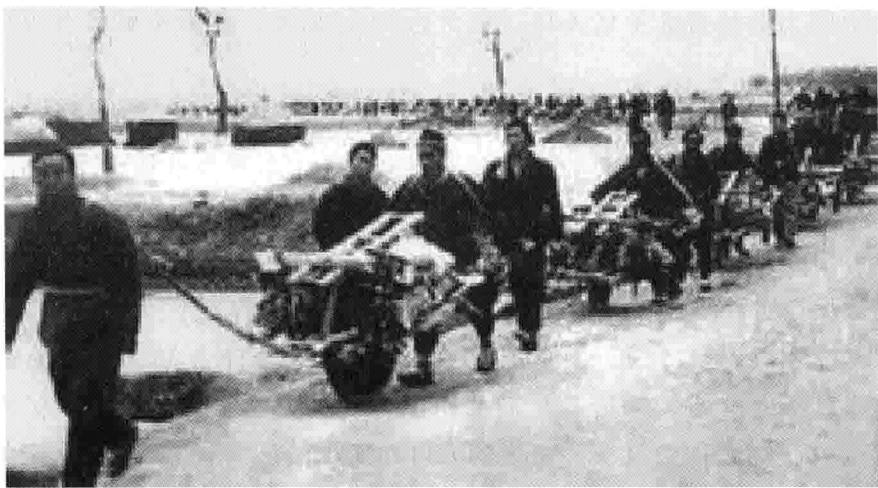


图 1-1 支前大军（百度图片）

希望：还是有一种老百姓“喜欢国民党”的，“国民党的仗，还是能够打下去的”。可当那个老头向他倾诉其“全部田产被平分”了”时，他才“恍然大悟”：这种“喜欢国民党”的人，原来“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①。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的法律地位，是中国亿万百姓给“注册”的；否定其历史合法性的人，不是对历史无知，就是居心不良。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把国民党赶到台湾，今天的中国会变得更好。其根据是：“今天的台湾比大陆好。”

笔者之所以说其莫名其妙，有以下四条理由：

其一，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根本不能假设。如果硬要假设的话，不妨做一个反假设：如果“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是国军而不是共军，他们还能被赶到台湾一隅吗？

其二，1949 年的台湾只有 600 万人口，至今也不过 2300 万人；当

^① 参见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沙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第 25～26 页。